

国别文学研究

文学的推销

——解读乔纳森·弗兰岑《自由》的商业性

陈广兴

内容提要:乔纳森·弗兰岑是当前美国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被誉为“伟大美国小说家”。他的成功,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的成功,而是文学市场运作的胜利。基于对当前美国读者、批评家和媒体的准确把握,通过对美国文学市场的深刻理解,他在文学内外采取了各种卓有成效的“推销”手段:紧随美国文坛的现实主义转向,以深沉的关怀烛照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沿袭德里罗式文学传统,撰写美国文坛所看重的“皇皇巨著”;驾驭媒体时代的宣传手段,以高超手法为新书造势。以弗兰岑2010年新作《自由》为例,探讨其文内文外的推销手段,来揭示其成功背后的秘密,可以引发我们对文学的商业性和经典的生成性的思考。

关键词:乔纳森·弗兰岑 《自由》 现实主义 悲剧现实主义 皇皇巨著 媒体

作者简介:陈广兴,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讲师,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Marketing and Literature: Jonathan Franzen's *Freedom* as a Case Study

ABSTRACT: Hailed as a “great American novelist”, Jonathan Franzen finds himself among the preeminent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s such as John Updike, Vladimir Nabokov and Toni Morrison. Using his novel *Freedom* as a case study,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mmercial aspect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literary canonization. It argues that Franzen's success as a celebrated author mostly stems from his ability to cater to a wide readership. An astute observer of the current literary market, he is able to win sympathy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by confronting them with real life issues, to impress critics by presenting them with a Delilloean “encyclopedic narrative”, and also to support his publisher by using mass media to promote his new book.

Keywords: Jonathan Franzen, *Freedom*, realism, tragic realism, encyclopedic narrative, mass media

Author: Chen Guangxing <gxccarl@126.com> is a lecturer at Institute of Liter-

ary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83).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2010年的美国文坛因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 1959—)而热闹非凡。弗兰岑的小说《自由》(*Freedom*, 2010)尚未发表,美国总统奥巴马即从书店购得禁止外流的预读本,在媒体的热炒下,引来一片批评之声,也点燃了公众对新作的期待。《时代周刊》为弗兰岑撰写专文,将其登上封面,冠以“伟大美国小说家”的头衔。英美媒体纷纷撰文回应,连中国多家报刊都转述一个伟大作家的诞生。《自由》面世后旋即引发抢购热潮,迅速登上畅销书榜。弗兰岑携新作成为“奥普拉读书会”的座上宾,“点石成金”的奥普拉把作家其人其作推向新的高度。弗兰岑作为2010年美国文坛的主角,带着公众人物的独特气质和强烈的时代性,以自身的成功演绎了小说作为商品的推销手段。

然而就在1996年,弗兰岑撰文表达了对小说和小说家命运的担忧。弗兰岑在著名文化刊物《哈泼氏》(*The Harper's*)上发表了题为《间或有梦:图像时代写小说的理由》(“Perchance to Dream: In the Age of Images, a Reason to Write Novels”)的长文,在这篇通常被称为《哈泼文》的文学宣言中,弗兰岑认为小说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小说的道路越走越窄,小说家的选择大幅缩水。面临大众媒体的负面影响,弗兰岑表达了对小说发展前景的担忧。(“Perchance to Dream”, 35—55)此前弗兰岑发表过两部长篇小说:《第二十七座城市》(*The Twenty-Seventh City*, 1988)和《强力运动》(*Strong Motion*, 1992),均如石沉大海。《哈泼文》的发表,对籍籍无名的弗兰岑而言,难免有自我辩白的嫌疑。时隔五年,弗兰岑发表第3部长篇小说《纠正》(*Correction*, 2001)被誉为“新世纪最优秀的作品之一”(Burn 83),获得“国家图书奖”。弗兰岑借此一夜成名,成为美国重要作家。姑且不论弗兰岑是否“伟大”,但作为小说家,他无疑非常成功。《纠正》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自由》引发的喧嚣与骚动更是锦上添花。《哈泼文》如同一个分水岭,区分了弗兰岑创作的两个阶段。他的成功不是单纯的文学创作的成功,而是一种文学内外市场运作的胜利。本文拟以弗兰岑最新作品《自由》为例,探讨其文内文外的推销手段,来揭示其成功背后的秘密,继而对文学的商业性和经典的生成机制进行思考。

《自由》顺应了美国文坛的现实主义转向,以深沉的关怀烛照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为作品赢得普通读者市场。

弗兰岑在书写前两部小说的时候,秉承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和哲学立场,似乎在努力成为伟大的后现代作家。他对此直言不讳:“我在书写自己的阴谋和末世论为主题的体制小说的时候,我盼望得到学术界和文坛的认可,这种认可品钦和加迪斯得到过,而索尔·贝娄与安·贝蒂(Ann Beattie)却没有”(“Mr. Difficult” 103)。弗兰岑模仿后现代主义前辈,选择一些诸如印度人控制美国警察局和波士顿地震等“疯狂的情景”,并以“巨大、外化的、错综复杂的情节”来呈现,同时作者冷漠而无动于衷地任凭事情发生(“Interview with Donald Antrim”)。然而弗兰岑的两部后现代小说《第二十七座城市》和《强力运动》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

弗兰岑注意到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浪潮正在悄然而至。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罗伯特·勒贝因发现,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被重新焕发生机的现实主义

所代替”(Rebein 220)。他认为,有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过去二十多年美国小说的出版、主流媒体的书评和学校文学课程安排上印证这一事实。不要说像威廉·沃尔曼(William T. Vollmann)这样不太出名的后现代作家开始发表诸如《皇室家庭》(*The Royal Family*, 2000)等现实主义小说,就连后现代小说的旗手唐·德里罗也书写了明显带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 1997)。对现实主义的偏爱在美国已经蔚然成风,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从事文学创作,参加各种文学讲习班,而他们得到的效仿对象往往是现实主义的雷蒙德·卡弗(Raymond Carver),而不会是后现代主义的罗伯特·库弗(Robert Coover)。由于多媒体和通俗文学的竞争,当今严肃小说的读者流失非常严重。而后现代主义小说以其文字游戏和碎片化叙事等手法,使得读者更加望而却步。其实弗兰岑《哈泼文》大量的篇幅就在论述严肃文学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转向必将成为很多作家的选择。虽然在谈到后现代主义创作失败的时候,弗兰岑声称自己更加钟情于现实主义,他曾说:“我喜欢的是与社会紧密相关的小说”(“Mr. Difficult” 103),但弗兰岑的现实主义转向,是他在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中的受挫导致的,更多地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基于读者市场做出的明智调整。

弗兰岑把自己的写作称为“悲剧现实主义”。希望立足于最“平常”的身份,用无功利的心态书写他喜欢的“人物和地点”(“Perchance to Dream” 54)。弗兰岑用尼采的悲剧思想来解释自己的“悲剧现实主义”,认为“用美学的形式再现人类的痛苦具有拯救意义”(52)。弗兰岑明白,信息时代的读者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现代媒体以其多样性和及时性,为读者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源,读者阅读小说的初衷不再是获取信息。另一方面,文学的揭露和反抗功能也往往是经院学术圈子的自说自话,通常是一种停留在纸面上的伪“颠覆性”。读者阅读小说的动机,还是想从小说的人物身上寻找认同,借助作者的叙述,体悟自己的生活。弗兰岑的“悲剧现实主义”,显然是针对这样的读者市场而采取的相应产品策略。

弗兰岑2010年发表的《自由》充分体现了“悲剧现实主义”的宗旨,为作者赢得了大量的普通读者。作者不是如后现代主义作家那样塑造抽象而符号化的人物,而是立足于最大化地呈现美国最普通的民众。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最正常不过的人物,既无过人的天赋,也无古怪的癖好。所有的人都在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生活。即使偶尔有出格行为,也未超出普通生活的可信范畴。同时,《自由》刻意地避免了文学界所热衷的“种族、性别和阶级”主题,而是讲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故事。小说中的伯格兰德一家四人住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父亲沃尔特是个老好人,待人诚恳,思想开明,一心拯救世界,有时未免书生生意气;妻子帕蒂小时不受家庭看重,婚后努力做好家庭主妇这一职业,有点虚荣,有点自我中心;女儿杰西卡喜爱读书,闲静少言,是个大好的文学青年,具有书呆子的执拗劲;儿子乔伊独立早熟,虽然不是事事都离经叛道,但其行为总会有出人意料之处。此外,还有三个重要人物,其一为独立摇滚音乐人理查德,其二为乔伊的女友康妮,其三为沃尔特后来的女秘书拉里萨,均是虽有瑕疵、却极其“正常”的人物。书写普通民众,聚焦“主流”人物,使得更多的读者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自由》也不像后现代小说那样刻意发明情节,大量堆砌事件,而是着眼于最具体的生活细节。小说没有剧烈的社会动荡,意外事故非常罕见,巧合在小说中也很少发生,小说人物也从未处于某种极端的情景之中。这种四平八稳的书写,最大程度地刻画了普通民众最真实的生活面貌。帕蒂是全职太太,日常工作就是买菜做饭,相夫教子。不大关注听话的女儿,却特别宠爱儿子,在邻居面前总是以抱怨为由来夸赞儿子。母亲的溺爱培养了乔伊过于强烈的独立意识,夫妻二人经常因教育乔伊而发生分歧。乔伊与邻家女子康妮相好,和父母冲突后搬去

邻家与康妮同住。这使沃尔特和帕蒂的夫妻关系雪上加霜。随着两个孩子陆续上了大学,他们变卖房产,举家前往华盛顿。帕蒂一直对大学时认识的理查德念念不忘,终于在湖滨小屋与理查德干下了苟且之事。沃尔特从中知道了两人的私情,暴怒中把帕蒂赶出家门。帕蒂去和理查德同居,沃尔特和拉里萨顺理成章地走在一起。拉里萨在车祸中罹难,沃尔特去湖滨小屋隐居。帕蒂与理查德性格不合,几个月后分手,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事件后,帕蒂决心去寻找沃尔特,两人最终言归于好。故事始终在家长里短的细节中推进,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生活情景,读者很容易在其中产生共鸣。

《自由》所呈现的真实,更多是人物的心理真实。由于弗兰岑认为小说已经不再是提供信息的手段,因此小说的关键是呈现人物内心,让读者从中寻找慰藉。小说人物大多生活在痛苦之中,心情压抑、精神抑郁几乎成了所有人的共性。与其前两部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小说不同,《自由》中虽然也出现以掠夺石油为目的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虽然也有各种形式的环境破坏和政治腐败,但这些事情对人物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带来直接的影响。弗兰岑在《哈泼文》中说道,他“每天都面临一种内心的困境:我的痛苦是来自某种灵魂的内在缺陷,还是来自于社会的缺陷”? (“Perchance to Dream” 36)。同样,我们也很难确定《自由》中的人物为何受苦受难,不能断定是社会因素还是个人因素让他们痛苦。精神抑郁是现代社会的比较普遍的现象,不仅弗兰岑本人如此,他的好友大卫·华莱士一生受到抑郁症的折磨,2008年不堪忍受病痛,以自杀结束生命。《自由》中的人物吸毒者有之,酗酒者甚众,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心里的痛苦所致。

《自由》中人物的痛苦,远离了经典悲剧的范畴,贴近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弗兰岑在采访中曾说:“根据我个人体验,每天的生活,甚至每一小时的生活,都是不断的冲突和分裂”(Conery 37)。弗兰岑很推崇尼采的悲剧概念,把自己的创作称为“悲剧现实主义”。悲剧的核心就是内心的分裂,分裂就意味着冲突和选择。人的悲剧性,更多是内在和心理的,这一点在《自由》中也有很充分的体现。在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的《苏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 1979)中,苏菲被纳粹逼迫从儿子和女儿中选择一个送往毒气室。像这样极端的选择在《自由》中并不存在,更多的是稀里糊涂的内心纠结。帕蒂迷恋性感的理查德,却达不到刻骨铭心;帕蒂很在乎沃尔特对自己的爱,却做不到死心塌地。帕蒂真心实意地想过好与沃尔特的日子,却难以遏制心底对理查德的渴望。无论是帕蒂与沃尔特的结婚,还是与理查德的私情,严格来说,都没有经过激烈的思想冲突,都是针对眼前的情况做出的即兴举动。帕蒂的情况对小说中其他人物都适用,古典悲剧中价值观的激烈冲突被随波逐流的偶发事件所取代。这样的情节虽然破坏了经典悲剧的纯粹性,却更加符合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自然能够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

近年来,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美国民众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9·11事件和反恐战争也进一步激发了美国民众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美国近几年的主要获奖作品几乎都是关注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品。以普利策小说奖为例,美国女作家伊丽莎白·斯特鲁特(Elizabeth Strout)以《奥利芙·吉特里奇》(*Olive Kitteridge: A Novel in Stories*, 2008)获得2009年普利策奖小说奖,讲述退休女教师的日常生活;保罗·哈丁(Paul Harding)以其处女作《小炉匠》(*Tinkers*, 2008),获得了2010年度的普利策小说奖,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父子三代的人生体验。《自由》以细腻的笔触,聚焦美国最普通的人物,描述他们最真实的生活,揭示他们最深沉的痛苦,呼应了文学向现实的回归,迎合了美国民众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同时,透过

平淡的生活表面,体察现代人类滔天的欲望和无边的痛苦,《自由》的确能够赢得那些在欲望都市挣扎的读者的共鸣。弗兰岑“有能力把读者置于人物的生活之中,使他们的痛苦成为我们的痛苦”(Robson 75)。小说中浪子回头的故事和大团圆的结局,也为经济困顿中的美国民众带来一丝暖色。诚如弗兰岑本人所言:“写出无比真实的语言,让人们能够从中找到慰藉:这难道还不够吗?”(“Perchance to Dream” 49)

二

《自由》沿袭德里罗式文学传统,撰写美国文坛所看重的“皇皇巨著”,借此获得批评界的认可。

仅仅凭借书写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确不足以成为影响深远的著作。一方面,经过后现代的发展,人们对小说的写实能力产生怀疑,对小说的建构性进行反思。因此,后现代之后的现实主义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必须重新思考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并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实现。另一方面,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个人的生活时刻处于巨大的全球化网络之中。经济危机、反恐战争、气候恶化、能源危机等全球性话题,与美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孤立的个人生活,已很难真实体现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面对这两方面的问题,弗兰岑向后现代主义学习,选择“皇皇巨著”,来书写自己的现实主义小说。

“皇皇巨著”(big, ambitious novel)是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对几部后现代大部头著作的称呼,用来指品钦的《梅森和迪克森》(Mason & Dixon, 1997)、德里罗的《地下世界》、拉什迪的《她脚下的土地》(The Ground Beneath Her Feet, 1999)和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Infinite Jest, 1996)等作品。(Wood 178)伍德所列举的“皇皇巨著”部头巨大,内容庞杂,用来体现后现代主义者所关注的碎片化和多元化的生活。伍德将这些后现代巨著命名为“歇斯底里现实主义”(hysterical realism),并对其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作品试图以包罗万象的内容来获得影响力。弗兰岑虽然摒弃了这些作品的后现代手法,避免了伍德所批评的对活生生人性的忽略,却沿袭了其“巨著”形式,用现实主义手法书写“皇皇巨著”。用韩国东西大学的迈尔斯的话说,弗兰岑遵循“皇皇巨著”的传统,“在小说中塞入所有相关主题,然后寻找一个足够‘典型’的家庭把所有的事情拢起来。在书的前后封面之间塞入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越多,他就会被认为越雄心勃勃”(Myers 115)。在他看来,只要是“皇皇巨著”,人们还没有阅读,就会被贴上重要作品的标签。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弗兰岑的《自由》尚未出版,就已经被媒体定义列入重要作品的行列,“皇皇巨著”的身份功不可没。

马克·格雷夫(Mark Greif)认为,伍德所谓的“皇皇巨著”是由于“小说之死”的威胁所致(11—30)。弗兰岑很显然对此深有同感,《哈泼文》基本上就是对“小说之死”的阐述和抵制。小说之死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进入主流文学批评视野则始于二战后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艺术与命运》(“Art and Fortune”, 1948)一文。特里林认为小说死亡的原因有三:第一,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已经枯竭;第二,小说应特定文化环境而生,而文化环境已时过境迁,新的文化环境呼唤新的想象形式;第三,小说所反映的现实虽然存在,但其强度更甚,小说反映乏力(1271—72)。弗兰岑在《哈泼文》中列举了小说生存面临的众多威胁,诸如通俗文学、非虚构文体、大众媒体的空前鼎盛、时代的复杂化、读者的流失等。弗兰岑同二战后的诸多美国作家一样,需要借助“皇皇巨著”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来证明小说的“活力”。

“皇皇巨著”,顾名思义,一定要巨大。这种巨大既是书本实际的厚度,也是一种延展性和

开放性,一种包罗万象的感觉,其内容之丰富,要远胜情节的需要。从页码上来说,《自由》厚达 576 页,完全符合“巨大”的标准。从内容上而言,小说绝不仅仅局限于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铺陈,也不仅仅如《纽约时报》著名书评人角谷美智子所说——《自由》描述了“一幅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巨大的、厄普代克式的图画”(Michiko Kakutani)。弗兰岑想要呈现的是 20 世纪末到奥巴马执政伊始这段时间的美国全景图。弗兰岑在接受采访时说:“人物总是与更大的美国视野共存”(Connery 38)。为了能够产生这样的“美国视野”,弗兰岑将伯格兰德一家置于宏大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之中。

从地域上,弗兰岑设计了非常广阔的小说背景:小说不仅在美国中部和东部来回切换,而且新加坡、拉丁美洲、东欧、伊拉克、以色列等世界各地与小说人物的生活密切相关,赋予小说宏大的地理背景。从主题上来说,弗兰岑致力于表现美国的重大事件和全球性的重要主题:美国近年来最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 9·11 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对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弗兰岑通过人物设计和情节安排,让小说人物和这些事件发生密切的联系。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的竞选也是近年来美国人热议的话题,弗兰岑的小说人物也参与其中,与切尼等人摩肩接踵。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全球话题,同样占去了小说相当的篇幅,小说中最主要的两个人物——沃尔特和拉里萨——的工作和生活与环境保护息息相关。其他重要主题也一一出现在《自由》中,诸如官商勾结、媒体暴力、网络经济、流行文化、商品时尚、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等。美国生活琐碎的细节和主题更是不胜枚举。

简明易懂的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虽然能够吸引一部分普通读者,但仅仅凭这两样东西,却不足以吸引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而正是这些人掌握着当今严肃作家的命运。弗兰岑一直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一直以严肃作家自居,2001 年他与奥普拉的争议就源于此点。当今作家的文坛地位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第一,文学评奖;第二,批评家的评论;第三,高校文学课堂。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决定着所有的三个方面,因此,要想在美国文坛有所作为,除了满足读者需要,还必须能够吸引研究者的关注。是否发表过“皇皇巨著”,是定位一个作家的重要依据。发表过“皇皇巨著”的作家,有更大的机会进入文学史,并成为批评家关注的对象。美国文坛的两位老将罗斯(Philip Roth)和欧茨(Joyce Carol Oates)老而弥辣,健笔如飞,近年来每年都有新作问世,数量虽多,却因分量单薄,难获文坛青睐。

三

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以外,弗兰岑驾驭媒体时代的宣传手段,以高超手法为新书造势,把《自由》变成一个新闻事件,从而提高小说的知名度。

商业社会中,文学也成为一种商品,并遵循商品的流通原则。弗兰岑在 2010 年的美国文坛掀起的喧哗,无疑是作为商品的文学的自我宣传。虽然弗兰岑在《哈泼文》中认为大众媒体对严肃作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他本人却借助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成为 2010 年的美国文坛的重要人物,无论美国读者是否真正能够通读其小说,但《自由》的销售业绩却是每个作家梦寐以求的结果。弗兰岑的成功,与他驾驭媒体的高超技巧密不可分。

媒体社会的秘诀是:不怕有人批评,就怕没人搭理,曝光率是提高知名度、进而获得成功的关键。弗兰岑很显然深谙此道。2001 年《纠正》发表之后,奥普拉将其列入推荐书目,邀请弗兰岑到节目座谈。弗兰岑收到邀请后,对媒体表达了自己对奥普拉选择标准的质疑,害怕奥普拉推荐书目的标签影响自己高雅文学的身份。弗兰岑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奥普拉随即取消

了对弗兰岑的邀请。一时间众人纷纷撰文,有人对他的言行进行批评,有人则对他进行维护,所讨论话题蔓延到白人(弗兰岑)与黑人(奥普拉)的种族之争、严肃(弗兰岑)与通俗(奥普拉)的文化之争。争吵使弗兰岑声名大振,其作品《纠正》获得良好的市场业绩。

《自由》也采取了相似的市场手段。在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弗兰岑在《纽约客》上两次出版了该书的一些章节,并频频现身公共场合,阅读部分章节,并讨论新作。在正式出版之前,一个早期版本被“错误”出版,出版商哈泼科林斯虽然推出了以旧换新,但成千上万本已经销售出去的“错误”版本很难召回。同样在《自由》出版前夕,《时代周刊》把弗兰岑登上封面,并发表由著名《时代周刊》书评人格罗斯曼(Lev Grossman)撰写的文章《乔纳森·弗兰岑:伟大的美国小说家》(“Jonathan Franzen: Great American Novelist”)。10年前史蒂芬·金也曾获此殊荣,以在世作家身份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弗兰岑曾批判说,史蒂芬·金是“大额的合同使他登上封面”,真正的推手是金钱,而非文学本身(“Perchance to Dream” 38)我们其实也可以以同样的观点看待弗兰岑登上《时代周刊》事件,因为究其实质,这是为新作宣传造势而已。《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员伦·查尔斯认为,这一事件和后来奥巴马总统获得预读本事件,使得弗兰岑的《自由》成为2010年度美国“最翘首以盼”的作品(Charles)。虽然我们相信读者对弗兰岑的期待,与其国家图书奖获得者的身份和新作的内容密不可分,但这两起媒体事件对《自由》的宣传作用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虽然弗兰岑与奥普拉曾发生过不愉快,但《自由》发表后很快入选奥普拉读书会书目,弗兰岑也应邀出席讨论作品。杰里米·格林对奥普拉读书会进行过详尽的研究,发现该读书会的精髓就是“小说和生平之间的联系”(Green 84)。要么作品被当作作者亲身体验的描述,要么作品被当作读者应该模仿的状态。在《自由》中,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在作品和弗兰岑之间建立联系,例如弗兰岑本人和沃尔特一家的美国中部生活,作者生活中和小说中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弗兰岑的观鸟爱好与小说中沃尔特的爱好,弗兰岑好友华莱士的咀嚼烟草习惯与小说中理查德同样的习惯。同样,小说中多个人物的迷途知返,也能为读者指明人生方向。其关键词“自由”屡屡出现在行文中,更是为“小说和人生”提供充分的发挥余地。例如帕蒂“感觉有一种更加空泛的自由在折磨着她,但她却无法对其放手”(179)。针对这句话,读者拥有巨大的阐释空间,可以从自由与责任、自由过度的危害等角度谈论人生体验。弗兰岑积累的名声,加上小说中众多的“人生感悟”,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奥普拉的一时之选,而他的人选反过来又增加了弗兰岑成功的筹码。

从文学成就本身来说,弗兰岑的《自由》在描绘日常细节、刻画人物心理、反映时代特征、表达社会关注等方面体现了作家高超的写实技巧。然而文学作品的市场表现并非简单地取决于艺术成就。文学批评界早已对“小说之死”的论调失去了兴趣,倒是小说家却时时提及这个话题。小说固然不会死亡,但当前小说家所面临的压力却实实在在,与日俱增。经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技巧已经很难推陈出新。读图时代读者的流失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想要在当今的文学市场上分得一杯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把握文学市场,在文学内外进行营销,弗兰岑算得是一个成功者。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Burn, Stephen J. "Jonathan Franzen." *American Writers, Supplement XX*. Ed. Jay Parini. New York: Charles

- Scribner's Sons, 2010. 83-99.
- Charles, Ron. "Jonathan Franzen's New Novel Freedom." *The Washington Post* 25 August, 2010.
- Connery, Christopher. "The Liberal Form: An Interview with Jonathan Franzen." *Boundary 2*(2009): 31-54.
- Franzen, Jonathan. "Mr. Difficult." *The New Yorker* (29) 2002: 100-12.
- . "Perchance to Dream: In the Age of Images, a Reason to Write Novels." *Harper's Magazine* 292. 1751 (April 1996): 35-55.
- . *Freedo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 . "Interview with Donald Antrim." *Bomb* 77 (Fall 2001). 22 July, 2011 < <http://bombsite.com/issues/77/articles/2437> > .
- Green, Jeremy. *Late Postmodernism: American Fiction at the Millenniu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Greif, Mark. "'The Death of the Novel' and Its Afterlives: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Big, Ambitious Novel'." *Boundary 2*(2009):11-30.
- Grossman, Lev. "Jonathan Franzen: Great American Novelist." *Time Magazine* 12 August, 2010. 22 June, 2012 <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010185,00.html> > .
- Harding, Paul. *Tinkers*. New York: Bellevue Literary Press, 2008.
- Kakutani, Michiko. "Jonathan Franzen's 'Freedom' Follows Family's Quest." *The New York Times* 15 August, 2010.
- Myers, B. R. "Smaller Than Life, Jonathan Franzen's Juvenile Prose Creates a World in Which Nothing Important Can Happen." *The Atlantic* 3(2010): 114-20.
- Rebein, Robert. "Turncoat: Why Jonathan Franzen Finally Said 'No' to Po-Mo." *The Mourning After Attending the Wake of Postmodernism*. Eds. Neil Brooks and Josh Toth. New York: Rodopi Press, 2007. 201-22.
- Robson, Leo. "I Feel Your Pain, The Difficulty of Being Jonathan Franzen." *New Statesman* 27 September 2010: 74-77.
- Strout, Elizabeth. *Olive Kitteridge: A Novel in Stor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 Trilling, Lionel. "Art and Fortune." *Partisan Review* 15. 12 (December 1948): 1271-72.
- Wood, James. "Hysterical Realism." (2000) *The Irresponsible Self: On Laughter and the Novel*. New York: Picador, 2005. 178-94.

(责任编辑:徐蕾)